



2005--2006：中国的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(杨帆)

(2006-2-25 16:16:58)

作者：杨帆

下才可能当主角，那就是中国面临国内外重大危机的时候。这才是我们真正不愿意看到的。

2，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

1992年以后左派彻底失去了主流地位，自由主义在中国再一次发展起来，但特点比起80年代大大不同。

第一，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，采取独立的话语系统。

第二，自由主义某些代表人物，在中国发展自由主义理论，其定位有偏差。

----庸俗的历史进化论，文化一元论，普适价值论，西方中心论；进一步鼓吹文化买办化；主张以西方学术标准开展中国的学术界；

----历史虚无主义，革命无用论，造反无理论。

----近代史两个病灶，民粹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。

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偏见和非理性，对形势的误判，他们始终把“左倾”作为主要危险。只有接受民生主义和爱国主义，自由主义才有出路。

第三，经济自由主义大肆泛滥，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，他们有国际势力支持，国内利益集团需要，有官方大力扶植和破格提拔，很快就树立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，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。西方经济学不仅成为科学，

也同时成为信仰体系，经济学越位，在中国成为神学（见杨帆2000年深圳特区报）。

作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，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比国际同行更加嚣张。他们积极鼓吹以下主张：

----盲目服从西方全球化的话语霸权，否认劳动力自由流动；假设没有国家利益，盲目鼓吹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；反对国家产业政策，鼓吹中国做全球加工厂，依靠国际跨国公司技术；

进一步主张与国际霸权妥协，损失国家安全利益；

----假设没有权力体系，或者默认权力体系的腐败，主张以腐败作为改革的润滑剂；

----私有产权万能论，进一步主张以权力体系瓜分国有资产；

----使用比较利益，市场万能论等为两极分化辩护，把中央关注民生的方针贬低为民粹主义；主张使用国家机器镇压群众反抗；

----为正在形成的“精英联盟”

提供理论，使他们由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。这些为权力垄断买办资本服务的理论“极右”的程度，其代表人物嚣张的程度，历史罕见，世界罕见。许多人高官厚禄，腐化堕落，拥有巨额财产，成为特权阶层一分子。他们掌握许多关键岗位，能够影响决策，操纵媒体。把改革的问题归咎于他们，一点也不冤枉。

3，95年以后，极右的瓜分派成为主要危险，非主流经济学家不得不同时进行左右两条战线的理论斗争，

1975---1995年基本的理论斗争格局是：以中右为主导，联合中左和群众舆论，反对“极左”，推动改革开放，这一斗争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。老左派几次回潮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必须指出，1995年以后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理论界矛盾的焦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

不再是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斗争。极右的“瓜分派”

成为最主要的危险。与极右对立的，有新左派，民族主义，经济学非主流派，老左派，也有自由主义左翼即“中右”理论家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理论界有三类划分：

第一：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”。新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理论资源，对新自由主义系统有系统批判，

理论上是到位的，问题是其理论表述过于理论化，与国内实际结合不够，有片面性。

由于“左派”在中国长期是贬义词，因此被自由主义者渲染为反对改革开放，成为打击反对意见的政治帽子。

第二，“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之争”，论题虽然集中于经济方面，但由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

所以经济争论就是全部思想理论争论的核心，如同遵义会议集中于军事问题一样。

我们“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家”，经过长期理论斗争证明，都是真正忠诚的共产党员，新社会主义者，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，

我们尊重中国革命的历史，尊重开国领袖毛泽东；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，与中国的工农兵大众有血肉感情；我们注意学习世界经验，决非教条主义，

封闭保守之辈。这些都已经通过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证明，现在之所以要强调基本立场，

实在是因为极左派要夺话语权，我们不得不同时进行左右两条战线的理论斗争。

在10年以来与中国新自由主义极右瓜分派的斗争中，我们形成了自己基本的理论主张：

——在发展问题上，以大国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国特殊的大国崛起路径；坚决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，防止中国退化到拉丁美洲化的道路。

——在开放问题上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崛起路径，打破资本逻辑，改变没有外部敌人的假设，主张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进行战略调整；非主流经济学家多年来坚持的动态比较利益，爱国主义，国家安全，大国崛起，发展战略产业，自主创新，逐步为社会和决策层接受。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，

采纳了经济学非主流和爱国主义学者的大量观点。

——在改革问题上坚持改革公平性，理论上超越左右翼，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教条和原教旨主义，提出新的改革指导思想；比如在企业改革问题上超越制度与产权之争，国有私有之争，军工民用之争，采取“国家战略产业”的概念，

争取把上述种种统一起来。特别是要指导民营企业，从民营经济上升到民族经济。

——在理论格局上，我们坚持以“中左思想”（新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）为主导，团结“中右”（自由主义左翼和中间派），

联合原教旨计划经济学派（老左派），共同反对“中国，新自由主义的，极右的瓜分派”。

2004年我们参与的郎顾之争，就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格局。

我们甚至能够在中央精神指导和网络舆论支持下，打破似乎是强大无比的“精英联盟”，

揭露了他们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。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斗争，2005年以来瓜分派经济学家丧失社会公信力，经济学“归位”，说明了经济学“非主流派”的胜利。

这样的理论斗争格局是各派理论家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，最终是受到实践和群众检验的，

这不是资本可以左右的，不是媒体大腕可以策划的，也不是依靠什么官可以“封”的。只要顺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，

中国改革的偏差就有可能被逐步纠正，改革开放不仅不会被否定，反而会更加健康地沿着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”的方向发展下去。

但是，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突然以大力度出来争夺话语霸权，使理论界出现了复杂的形势。

以刘国光文章为代表，实际上提出了第三种理论斗争模式——“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之争”。

4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，

这是“老左派”长期以来的话语。他们1992年丧失主流话语地位以后处于非主流地位，反而有进步，一系列《万言书》触及了中国实际中的真问题。他们的缺点是理论教条化，话语系统老化，不能进行实证研究，没有可行对策。即使如此，如能把自己定位于“非主流”地位，走向民间，长期做市场经济的批判者，其理论将长期掌握群众，就象毛泽东思想一样，

精英们的污蔑否定，在群众中间完全无用。毛泽东说过，世界上的思潮大约有两类，一种是主张压迫有理，剥削有理的；

一类是主张造反有理，实际上是帮助弱势群体讲话的，这样的思潮有长久的道德魅力，也能够影响政策，

但是一般情况下，只能处于“非主流”的地位，它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，以制约精英的腐败。

毛泽东派是这样定位的，所以能够在民间蓬勃发展。

但中国的“传统马克思主义者”却偏不如此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